

中国的现代性与人文学术丛书

转折时期的精神转折

“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思潮及其走向

高瑞泉 杨扬 等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转折时期的精神转折

“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思潮及其走向

高瑞泉 杨扬 等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转折时期的精神转折：“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思潮及其走向/高瑞泉，杨扬等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9

(中国的现代性与人文学术丛书)

ISBN 978 - 7 - 5325 - 5063 - 0

I. 转... II. 高... III. 社会思潮—研究—中国—现代
IV. D09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17178 号

中国的现代性与人文学术丛书

转折时期的精神转折

——“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思潮及其走向

高瑞泉 杨扬 等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上海颀辉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8.25 插页 2 字数 423,000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2,300

ISBN 978 - 7 - 5325 - 5063 - 0

B·643 定价: 58.00 元

如发生质量问题, 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丛书主编 高瑞泉 王晓明

编辑委员会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晓明 王家范 朱政惠 余伟民
陈大康 陈子善 陈嘉映 杨国荣
高瑞泉 盛邦和 童世骏

序“中国的现代性与人文学术”丛书

高瑞泉

现代性研究在当今中国可谓方兴未艾,尽管“现代性”本身已经绝对算不上新鲜的话题。坊间正流行着各种各样翻译介绍西方学者的现代性批评论著,从哈贝马斯到查尔斯·泰勒,从福柯到夏尔·波德莱尔,说明“现代性研究”本身作为对现代现象的总体性反思,如何引起了中国知识界的关注和热情。同时也展示了现代之后的世界,精神之芜杂和意向之分歧。不过,我们组织编纂出版这一套“中国的现代性与人文学术”丛刊,并非只是泛泛地参与到对时代核心问题的讨论之中,而是自觉地意识到现代性研究中两个相互勾连的环节:第一,“中国的现代性”;第二,现代性视域中的人文学术。它们构成了本丛书所措意的核心对象,希望以此为中心来贡献我们对现代性问题的研究和思考。

“中国的现代性”的概念,以多元现代性或多重现代性之存在为前提。与早期的现代性研究者的观点不同,今天越来越多的人承认单一性不是现代性的正确摹写。哈贝马斯说黑格尔是第一位意识到现代性问题的哲学家。不过 18 世纪的黑格尔不仅是一位

欧洲中心论者,而且是德国中心论者,中国则完全在他的总体历史之外。本世纪第一年,哈贝马斯应邀访问华东师范大学,在午宴上盛赞中国,说他站在东方明珠顶楼眺望上海,感到自己正在“世界的中心”(the center of the world)。让人领略这位理论大师在社交场上的机敏与魅力,也让我们这些东道主的虚荣心得到无伤大雅的满足。当然“中国的现代性”之被重视,并不仅仅因为中国经济起飞或“中国崛起”成为一个流行的话题,还因为我们对中国经验具有的文化反省和文化自觉。经济现代化的历程,不但使得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传统有了更合乎辩证法的理解,而且真正面对了哈贝马斯所说的那个历史节点:只有当经济合理性和官僚合理性(即认知-工具合理性)明显占据统治地位时,现代社会的病症才会暴露出来。

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与世界日益被普遍的市场秩序殖民化相比,使用文化概念来重塑本土现代性的努力是无足轻重的。譬如詹姆逊就认为,人们谈论拉丁美洲的现代性、印度的现代性、非洲的现代性和儒家的现代性等的时候,会忽略了现代性的资本主义全球化本质。当讨论到全球化中的民族文化的时候,许多人会实际上承认存在着多种多样的现代性:詹姆逊就几乎同意约翰·格雷(John Gray)的说法,即世界经济的增长,并不一定引起普遍的文明,如像斯密和马克思所认为的那样。相反,它允许种种本土资本主义的发展,它不同于理想的自由市场经济,彼此之间也互不相同。它造就的政权通过恢复自己的文化传统来获得现代性,而不是模仿西方国家。因此有多种不同的现代性,就像在现代化过程中有多种失败的方式一样。

与单一现代性理论所依靠的历史单线进化论预设相反的是,二次大战以后全球化的进程同时出现了另一种状况,渐渐实现现

代化的非西方国家或社会,大多拒绝了与现代西方完全同质化的道路。一方面市场经济、民主化、个人主义、家庭变化、都市化、工业化、现代教育、大众传媒,到处都看到西方化的影子。另一方面,正如艾森斯塔德所说的那样:这些东西得到的定义和组织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建制类型和意识形态并不相同,所以多重现代性是对这样的客观情势的一种肯定性描写;诸多文化规划不断得到建构和重构。从全球看,在现代和现代化的社会里,在现代化的各个阶段甚至可以看到更加多样的具体的制度类型。作为一个东方大国,近代中国尽管饱受帝国主义的欺凌,但并未真正沦为殖民地国家;她的悠久而富有生命力的传统在与殖民主义对抗的过程中,成为民族意识的强化剂,它曾经与意识形态的目标相结合,或者直接诉诸文化创新的力量,来改写现代性的社会设计。更进一步说,现代性研究本质上是现代社会及其发展前景内在问题的知识化过程,是人类对自身存在的基本和永恒的若干问题在当下条件中的自觉,是人类对未来社会的理性规划的努力的一部分。因此,中国的现代性研究,应当在它的历史向度中表达当代人的批评精神和理论创造。已经有不少学者意识到深入研究“中国的现代性”之迫切与重要,并且已经有若干重要著作问世;但是迄今为止,学术界对“中国的现代性”的专门研究,总体上远不及对西方现代性理论的介绍和翻译之规模。因此,将中国的现代性作为本丛书的研究对象,自然表示了一种提倡和一份努力。

把中国的现代性研究与人文学术发展联系起来,是本丛书的又一重目标。众所周知,现今中国的人文学术,从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之学,经过 20 世纪的转变,尤其是取法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科学,由此纳入现代学院体制,成为现代学术形态的知识系统。如果我们同意现代性是特定社会现实和特定世界观的结合的

话,那么人文学术多多少少就是现代性的一部分,是现代性的自我确认,至少表达了现代性自我确认的努力。我们知道,现代人文学科的形成与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传统密切联系,现在汉语称作“人文学”,英文翻译为 the Humanities 的那些科目,在 15 世纪意大利指的是语法、修辞、历史、文学、道德哲学这一套科目,它们当然也包括了要学这些科目就必须具备的拉丁文和希腊文知识。虽然直到 19 世纪初才出现“人文主义”一词,但是后来人们普遍接受了像布克哈特那样的历史学家的观点,将人文主义用于他们认为与古典学问的复活有关的新态度和新信念上,即将现代人文学科中的新态度和新信念称作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显而易见,西方人文主义,不管其普遍性如何,都不是价值中立的知识。事实上,数百年来,以欧洲现代性为中心的世俗化人文主义无论在知识上还是在道德上都发生了复杂的变动。

另一方面,中国固有的人文学术当然有她悠久而伟大的传统,但是以古代“四部”之学为内容的传统学术,早就经历了 20 世纪的巨大变革,虽然并未完全变成绝学,毕竟已转变为现代学术的知识形态。且不说,当代中国精神的主流已经是这两股变动之流的不同程度的融合,即使是人文教育中引人注意的中国经典阅读的新实验,也实际上总是有意无意地在对古代经典作现代诠释。这种诠释或者是强调中国的人文传统具有民族特点的人文主义原则,或者是用一种普遍的人文主义来解释中国经典。无论是关于重写学术史的呼声,还是若干年前开始的对 20 世纪中国学术的回顾,其实都体现了对人文学术的反省意识和现代性语境中的人文创造。它的最近走向似乎与中国的现代性研究之旨趣有某种内在的契合。

随着全球化的浪潮,现代性的自我矛盾、自我分裂,在人文学

术的处境变化中获得充分的表露。西方人文主义并未幸运到能逃避其内在矛盾的发展,因而它自身就是分裂的。文艺复兴运动的主题是“人”,它转变成现代性的哲学表达就是主体性,但是后现代主义今天不但宣称哲学根本上要放弃追求那个大写的“真理”,主体性消失了,甚至说“人已死了”。与此相伴的是所谓“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自然科学特别是技术与市场机制的扩展,迅速地改塑着人文学科的空间,即使是学院体制内部也不能幸免。人文学术今天的悖论是:一方面人类因为迫切需要生产一种创新文化和提供作为选择的独特生活方式而特别需要非凡的知识上的努力;另一方面,这种知识生产不仅受制于内部的观念冲突,而且受制于外部的生存条件。如何破解这个悖论,实在是现代性研究的关键之一。

毫无疑问,“中国的现代性与人文学术”提示了巨大的研究空间,本丛书以此为目标,并不表示怀抱着短时间内就对它展开全面研究的雄心,而只是在提倡以一种持续、局部的具体问题之研究,尝试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逼近这个目标。对于中国的人文学者而言,无论是中国的现代性,还是现代性语境中的人文学术,都是道地的“为己之学”。所以我们不但相信,假以时日,这项研究一定可以积微为著,有助于我们整体理解现代性;而且相信即使是局部的,以个案为中心的工作,也自有其内在的价值。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1
一、历史的巨大转折	1
二、从现代化的焦虑到“现代化的陷阱”.....	9
三、中国社会的结构性变化	18
四、知识分子的生存状况	22
五、国际环境和民族复兴	29
六、从激进主义到保守主义的转折	39
第二章 主体性及其分化：当代中国哲学的基本面相	54
一、“实践”权威的恢复	55
二、李泽厚与建立主体性	57
三、主体性与教科书体系的突破	64
四、道德主体性与历史主体性	71
五、主体性的分化	88
六、从追求科学到科学主义批判	104
七、“启蒙”反思与政治哲学	110
八、“后现代”理论的解构	117

第三章 颠覆、重构与治疗：当代中国政治思潮	121
一、当代政治思潮的根源与三种面向	121
二、兴起、演进与主题	128
三、以价值重估为中心	144
四、改造权威体系的诉求	149
五、重构国家-社会关系	180
六、超越“左”与“右”	211
七、对全球化浪潮的回应	219
八、余论	229
第四章 从价值迷失到多元重建：新时期以来的伦理思潮	233
一、围绕人生价值问题的三次讨论	233
二、关于道德主体性的争论	254
三、功利主义研究的勃兴与沿革	271
四、弘扬传统文化	289
五、从“滑坡 vs 爬坡”到“制度伦理”的诉求	300
六、经济伦理等应用伦理学的兴起	317
七、集体主义道德原则的演变与价值多元化	332
第五章 “人的文学”与文学实验：20 世纪末的文学思潮	359
一、文学史断代和文学思潮划分的依据	360
二、人道主义文学主潮	367
三、文学主流与当代意识形态	377
四、文学思潮的多样性	386
五、“新时期”之后	405

六、“90年代文学”的基础	413
七、世俗化的趋向	431
八、城市化进程中的文学	444
第六章 以问题研究为中心的转向	457
一、现代性批评的兴起与走向	458
二、知识分子视野中的农村问题	476
三、当代知识分子宗教观念的变化	509
四、知识生产的分化与学术观念的演变	534
跋	568

第一章 导 论

一、历史的巨大转折

在中国漫长的发展史上,有若干极为重要的转折时期,它们在先前蕴藏的互相冲突的力量之间作出了抉择,社会生活突然开出了全新的面貌,并进而决定了而后相当一段历史的发展趋势。刚刚过去的 20 世纪的最后四分之一时光,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时期。它当然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巨大变迁的一部分,但就其变动之深刻、广泛、迅速而言,却尽可谓前无古人。19 世纪中叶,意识到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曾、左、李诸位“中兴名臣”,固然无法想象今日之中国;被目为“理想家”的孙中山先生曾经预言中国能够“突驾”,毛泽东则亲手发动过“大跃进”,并且断言他身后的数十年间,中国与世界都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他们是否预见到“突驾”与“跃进”竟然在 20 世纪末得以实现?将来的历史学家会对他们为中国的重新崛起而添加的砖瓦,作更为客观的评估,从而显示中国的现代化作为几代人为之奋斗的事业,具有内在的连续性。然而,最近的这一场巨大转折,却是以戏剧性的形式出现的:它以对毛泽东的浪漫主义实验方案的反拨为契机:毛泽东的逝世和“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开始

了拨乱反正的“新时期”。

“新时期”一词的出现及其立刻得到广泛的社会承认,说明这一概念是有生命力的。更进一步详细考证“新时期”这一名词使用的细节,属于历史学家的工作。经历过那种让人欣喜、充满希望,又有困惑与精神迷茫的状况,以及种种争论的人们,大约可以同意如下的判断:“新时期”之所谓“新”,最正面的意义是如邓小平1979年说的那样:“目前这个时期是我们党和我们国家的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时期。我们党已经领导全国人民胜利地渡过了‘四人帮’给我们设下的重重难关,把一个混乱的国家变成了一个有秩序的、进步很快的国家。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前景激励着、鼓舞着、引导着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广大干部、群众都在争着为这个光明前途贡献力量。”^①换言之,恢复了秩序和权威,现代化成为社会共识。它是与否定“文革”、重新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联系在一起的。但是,这并不表示整个社会的利益、欲望、价值是统一的,更不等于中国人对自己的现代化之路的所有细节,都已经十分清楚。事实上,我们回顾往事,就可以发现今天之中国,恰恰是在当初不断的争论和摸索中到达的。当“摸着石头过河”为“新时期”的改革实验作哲学注解的时候,正说明整个社会意识到我们面临着一个未知的领域。各种各样的方案、设想、要求、理论等等,似乎都希望获得实现的机会,背后当然更体现了利益的分化和理想的分歧。这种分歧或分化,当然不会永远停留在精神的领域,甚至可以导致重大的社会冲突。不过,它与近代开端期的冲突不同,它不是中国要不要实现现代化的问题,现代化已经呈现为不容抗拒的客观趋势。“新时期”以来的各种争论,综括起来,可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83页。

以集中为一个问题,即“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它是近代以来“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主题的延伸。

19世纪中叶以降,为了解救民族危亡,中国人发生了“古今中西”之争,包含着传统与现代、革命与改良、民主与专制、西方化与本土化、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种种争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而后的社会主义运动,使人们以为“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已经获得了解决。现代化同样是毛泽东时代的选择,而且我们应该承认1949年以后的三十年间,中国的现代化是有着巨大的增长的,即使是1970年到1977年那样的年份,中国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也达到4.5%,至少比当时世界上其他126个国家要更快。而且,“在中苏联盟突然破裂,接踵而来的‘文化大革命’吞噬了整个中国之后,世人对中国再次刮目相看。人们认为,中国将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来实现现代化,并同时能够避免许多通常被认为是现代化必然带来的后果,尤其是不平等。于是有人就认为,中国脱离公认的现代化之路而别开生面的做法将向世人证明,那种一提到现代化就言必称等级制、专门化、官僚集团和循序渐进的观念,势必要破产。根据这种见解,现代化过程的普遍形式将被中国革命领袖毛泽东所设计的那种能在显然地与与众不同的社会基础上实现经济增长的独特道路所否认”。事实上,对于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毛泽东时代也并非毫无争论,不过被一个独断的权威所压抑和掩盖罢了。“文化大革命”其实从另一个侧面暴露了这种争论。“文革”的终结注定了原先被压抑的选择将重新登上历史舞台:邓小平的复出乃是一个绝好的象征。“随着明显偏向于借助更为常见的途径来实现现代化的新领导抛弃了‘文化大革命’,中国突然又作为一种更常规性现代化的试验而成为举世瞩目的中心。中国的经验将有助于回答实现现代化所需要条件的规范性问题。世界各地人

士都在以一种特有的兴趣,关注着毛以后的中国领导何以能成功地实现其一再宣称的现代化目标。”^①西方的中国问题专家们如果总是用西方现代化的尺度来衡量的话,看来将永远无法真正理解中国。《中国的现代化》的作者,1982年出版本书的时候,看来根本没有想象到,仅仅20年以后,全世界都在惊叹中国的崛起!而且他们认为中国只是回到“现代化的常规道路”的观察,也被证明是片面的。尽管新时期以来,中国不断向外开放,“与国际接轨”成为一种标准和时尚,而且事实上中国已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像发达国家一样鼓励和发展现代技术,城市化的进程在加速。但是中国依然是中国。不仅其政治制度、意识形态都与西方国家不同,其市场经济体系的前面也应该冠之以“社会主义”的必要限定,传统的儒家文化正在受到更多的鼓励,使其能够为当代的现实服务。就是这样一个与“常规性现代化”既有相似点又有差别性的中国,从20世纪初的西方列强瓜分的对象,到1949年一跃而成为独立的国家,如今再跃而成为一个有望在未来挑战美国霸权的伟大国家。

历史从来是人们自己创造的,是人的有意识活动的结果。“今”一方面是“过去”的趋势之延续和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创造活动是被决定的;但是,另一方面,“今”又总是人们按照对“未来”的理想所作的安排,因此我们在历史活动中享有自由。现实就是决定论法则与自由意志在时间中的复杂交错。因此,中国的这一历史性变革,绝不是自然而然地实现的,相反,它是在人们的精神世界的变迁中并伴随着这一复杂的变迁过程而实现的。研

^① [美] 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页。

究精神变动与社会变动之间的关系,是哲学的任务之一。但是,现在我们不得不把自己的目标限定在描写当代社会的精神现象本身。换言之,我们以为这样一个前提是比较确定的: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历史变革的时代,自然而且应该会产生多种多样的社会思潮——有些是较为理论化的,有些是情绪的表达,还有的是二者兼而有之。完全无法设想,一个伟大变革的时代,会是一个万马齐喑的时代。现在人们通常把卡尔·马克思与马克斯·韦伯都视为现代社会科学之父。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社会存在、人们的经济关系、社会的经济结构决定着社会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生产关系的变革或迟或早地会引起上层建筑的变动。反过来,正如哲学最重要的任务是改变世界那样,观念的或精神的东西也可以成为社会变革的先导。与马克思注意阶级之间经济利益冲突的历史作用不同,韦伯更为注意价值、伦理取向和精神气质如何在现代资本主义的发生期起了重要的作用。这集中表现在他处理“近代经济生活的精神与惩戒禁欲的新教之理性伦理观念之间的关系问题”^①而作的那部名著中间。这两位先贤的理论都支持用哲学社会学的方式来处理思想史的问题。我们之所以以考察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思潮作为自己的任务,恰恰是因为这些思潮发生的同时,正是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中国人渴望已久的经济起飞,就是在1949年以后整个中国社会思想最解放、精神最活跃的那个十年中开始的。在它们的后面是整个经济结构、社会阶层、生活方式的变动。不管这些思潮本身的理论独创性和一贯性如何,它们都已经融合到当代社会变迁之中,成为当代史的重要构成部分。描述这

^① [德]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87年,第16页。